

解读《管子》的智慧

王学静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序

《管子》和管子学派的研究在建国以后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由于《管子》一书所包含的内容丰富，所以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时，该书都成为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重要一环。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方法从“贴标签”向微观化、思想史化的改变，《管子》的研究更显得深入而细致。其中，着眼于《管子》通体研究的著作如池万兴的《〈管子〉研究》；着眼于某一学科深入挖掘《管子》深刻内涵的著作如乐爱国的《管子的科技思想》、袁林的《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的相关章节；至于研究《管子》中某一方面思想而形成的论文如邓加荣的《〈管子〉经济思想初探》、王淑霞的《〈管子〉与教育》等，则不胜枚举。

现代学者痛感以往“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所形成的疏失、失真，从而大力深化《管子》及管子学派



的微观研究，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即研究成果和研究影响越来越局限于“象牙塔”之中，难以影响到大多数并非从事学术研究的普通人，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和时代效应无法彰显。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价值真空、虚无主义和片面个人主义的盛行，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等等，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又与以往“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有着重要关联。自“五四”以来，理论界一直坚持“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启蒙为己任的学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作为都是在努力廓清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保守性。应该说，他们的批判对于引领一个蒙昧的社会走向近现代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攻击使我们自身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丧失了历史文化的正当性，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全体所能认同的整体价值的崩塌。因此，近十年来，反思“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重建面向传统文化的事实、价值判定，已经逐渐成为了理论界的主流。由台湾的傅伟勋、韦政通两位教授所提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无疑代表了这一思想转向。而从海内外对这一理论的热切反响来看，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学人也对社会价值取向趋向于拜金主义、虚无主义有了警醒，深感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重新振起已经颓然的人心。

但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并不是思想史式的研究方式所能完成的，因为思想史式的研究方式关怀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转化”并非这一思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更不能解决社会价值、信仰的缺失问题。社会价值、信仰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王学静女士的新著《解读〈管子〉的智慧》一书，也许能提供给我们一条切实的思路。

该书首先肯定了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力：

“思想总会负重而行，这就是文化自身的生命力，而我们只是在这洪流当中逐着波浪的虫豸，最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不敢认为自己是如何地发明了一段先贤的智慧，事实上先贤的智慧就在那里，已经二千多年，等待着有能力的人自己去认取。”

文化不是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我们的理性去进行解剖的死物，而是一段生机流布的自我发展的历程；作为文化的研究者和接洽者，我们也不是外在于这样一股“文化流”的独立思维的存在，而是这一文化本身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抱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以自我生命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存在相感应，直下担当起历史文化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将历史文化重新引入现代社会的道德构建中去。

这一重新引入要求的不是思想史式研究的“求真”，而是社会价值层面上的“求善”。因此“是什么”的问题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先



贤的智慧突破历史造成的障碍，能够为更多的人理解接受”，即实现作者以及作者引领下的读者与先贤生命的直接对话。“对话”就意味着作者能够摆脱以往思想史式的研究范式，以思辨和体悟的方式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接续：

“这种理解不是寻常学术上所讲的理解……我们所需要的是常人的理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常人。所以我截取了《管子》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话，按照每段话的主题给它取了个名字，然后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选取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阐发这段话中的意思。有时，我也会加上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例子，让这个故事更容易为现代人看下去，同时也让这个道理看起来更容易为现代人接受。”

现代人的体悟所得的乃是现代的道理，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思路的实践化。在这一体悟基础上，其笔端流露出来的文字具备了社会人心的现实意义：

“这样一项工作如果能够使得一些人对《管子》这本书、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了解并产生些兴趣，那么这项工作于他们来说，就是有价值的，那么对于我而言，这项工作也就是值得继续的。”

作者认为，《解读〈管子〉的智慧》的文字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能够向一般人介绍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激发起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些许兴趣，甚

至是唤起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认同从而起到振起人心的作用。

《解读〈管子〉的智慧》一书所表现的由思想史式研究向思辨式、体悟式研究的转变，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之路的践履，是其学术意义之所在；而该书从“象牙塔”中投射出对社会人生的现实关怀，则表现出该书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社会意义。在对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都予以肯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定《解读〈管子〉的智慧》一书能够打通历史的阻隔，实现与管子的生命或者是管仲学派的生命群体的真正对话。传统不是概念的游戏，不是已无生机的死物，而是极具理想的价值体系和生命境界。在这一意义上，我相信王学静女士所著的《解读〈管子〉的智慧》一书能够如吴经熊博士《禅学的黄金时代》一书一样，成为一部极有意义，读来又饶有兴趣，能够发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的好书。

王立新

2007年1月16日

（序作者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目 录

导论 《管子》与管子	(1)
------------------	-----

第一章 《管子》教你的领导艺术	(12)
-----------------------	------

一、以天下为天下	(12)
----------------	------

二、毋犯凶而远忧	(19)
----------------	------

三、正国一爱	(26)
--------------	------

四、尚贤	(35)
------------	------

五、明法	(44)
------------	------

六、以上御下	(51)
--------------	------

七、处厚以御人	(58)
---------------	------

八、勿夺其事	(66)
--------------	------

九、知务	(72)
------------	------

十、识人	(80)
------------	------



十一、不弃其小	(87)
 第二章 《管子》教你成功之道	(98)
一、成事之法	(98)
二、小不识则不识天下	(110)
三、执一以御天下	(117)
四、守重与数应	(123)
五、以微射明	(130)
六、知几兆端而后为	(138)
七、不变无过	(145)
八、双赢	(154)
九、论爱施	(161)
十、予之为取	(167)
十一、“传统”的发明	(172)
十二、无必	(180)
十三、说权	(186)
 第三章 《管子》中的修身之道	(193)
一、修形德	(193)
二、慎交友	(203)
三、知当	(209)
四、慎听	(214)

五、慎言慎行	(220)
第四章 《管子》中的做人之道	(228)
一、待人	(228)
二、行为得度	(234)
三、虚无	(250)
四、大公	(263)
第五章 《管子》教你的做事之道	(277)
一、应物	(277)
二、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	(292)
三、谨立	(301)
后记	(315)

导 论

《管子》与管子

《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但现存的《管子》一书事实上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编订时有 86 篇，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 76 篇。其中体现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之一。大部分学者认为，《管子》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的著作的总集，但主要收集的是管仲学派的思想资料，所谓管仲学派，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与管仲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谈《管子》，就得先从介绍管仲这个杰出的政治人物开始。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颖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

管仲生于公元前 725 年的颖上（今安徽省北部）。他在贫穷中度过了童年，因家贫，曾做过马夫，做过小商



贩。公元前708年，管仲与鲍叔牙相识，结拜为兄弟，携手经商。十多年中，他们走遍了中原各国。公元前697年齐僖公拜管仲、鲍叔牙分别为二公子纠和三公子小白的师傅。公元前694年齐襄公继位后，好勇喜功，连年征伐邻国，国内横征暴敛，民怨非常之重。这年里，鲁桓公与夫人文姜来到齐国，齐襄公与其胞妹文姜通奸，并杀死了鲁桓公。公元前692年齐襄公荒淫无道，天怒人怨。为避齐乱，管仲、召忽奉公子纠投奔鲁国，鲍叔牙奉公子小白投奔莒国。公元前686年公子无知与连称、管至父内外勾结，杀死齐襄公，取代君位。随即齐国的大夫雍廩等人又杀死公子无知，齐国陷入一片动荡之中。

齐襄王和公子无知相继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成为了王位的争夺者。而公子纠此时在鲁国，公子小白在莒国，距离齐国都有数天的路程。管仲支持公子纠继位，并自告奋勇担当阻挡另一位觊觎王位的齐国公子小白的先锋。管仲率领的部队把公子小白阻挡在归国的途中，管仲向公子小白射了一箭，箭射在公子小白的衣钩上，小白诈做被管仲射中，却乘管仲掉以轻心的机会日夜兼程先赶到了齐国的首都，在齐国的两位高卿高偃和国子的支持下，抢先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为公子纠争位，齐、鲁战于乾时，鲁军大败。齐军乘胜夺取鲁国汶阳之地。

齐桓公决心报管仲射他一箭之仇，派人赴鲁，逼鲁

庄公杀公子纠，召忽殉主，管仲遣返齐国。齐桓公采纳鲍叔牙的建议，不仅没有治管仲的罪，反而请管仲担任大夫。公元前 684 年齐桓公不顾管仲反对，率兵伐鲁，在长勺与鲁军交战，被鲁将曹刿击败，大家熟悉的“曹刿论战”的故事就出自鲁国与齐国的这场大战。

长勺战败后，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支持管仲对内大胆进行改革，对外高举尊王的旗帜，实施称霸不用兵车战略。

公元前 681 年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与宋、陈、蔡、邾等国之君于北杏会盟，齐桓公主盟，以平定宋国内乱。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不参加北杏会盟，齐桓公率师灭遂，并以此向鲁国施加压力。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地（齐邑，今山东肥城南），会盟时，鲁国司马曹沫持剑劫桓公，要求退还汶阳之地。桓公依照管仲的意见，答应退地。公元前 680 年柯地会盟，使齐桓公名声大振，各国诸侯纷纷与齐结盟。至此，齐桓公真正认识到了称霸的本质，对管仲拥有了一种铭心刻骨的信任，拜管仲为“仲父”，这是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誉。也就在这年，齐桓公与管仲率师会同陈、曹两国伐宋，因宋违背北杏之盟，伐宋途中遇卫人宁戚，管仲荐桓公，桓公拜宁戚为大夫，宁戚赴宋说服宋桓公求和。

齐国的霸业蒸蒸日上，公元前 679 年齐桓公与卫、郑、宋三国之君盟于鄆（今山东鄆城北）诸侯咸服，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公元前 678 年，郑国违背鄆地之盟，



齐桓公与宋、卫之师讨伐郑国。是年，齐、鲁、宋、卫、陈、郑等国于幽地会盟。公元前 675 年齐桓公会同宋、陈之师讨伐鲁国。公元前 671 年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扈地。公元前 668 年齐、宋、鲁三国之师讨伐徐国。公元前 667 年齐与鲁、宋、陈、郑会盟于幽地。周惠王赐齐桓公为侯伯。

就在齐国霸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管仲审时度势，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变尊王称霸为尊王攘夷。公元前 666 年齐桓公奉周惠王之命，率师伐卫。公元前 664 年戎人侵犯燕国，齐桓公与管仲率师救燕，至令支、孤竹，剿灭戎。公元前 663 年齐师凯旋。齐桓公将讨伐戎的战利品的一半赠鲁庄公。公元前 662 年齐筑小谷（今山东东阿）为管仲采邑。鲁庄公为感谢齐桓公，为管仲在小谷筑城。公元前 661 年狄人侵犯邢国，齐桓公率师救邢，败狄师。公元前 660 年鲁国公子庆父作乱。为安定鲁国，齐桓公依管仲之谋，立公子申为国君，并大义灭亲，杀死与叛乱有关的亲侄女哀姜。是年，赤狄侵犯卫国。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击败赤狄，助卫戍守。公元前 659 年赤狄侵犯邢国，齐桓公与管仲同宋、曹两国联兵救邢，打败赤狄，为邢国在夷仪重新筑城，派军助邢戍守。公元前 658 年齐桓公率诸侯为卫国筑新城。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与管仲率齐、鲁、宋、卫、郑、许等国联兵讨伐蔡国，蔡侯闻风而逃，继而齐又以不尊周天子之罪讨伐楚国，楚请求讲和，诸侯与楚于召陵会盟。

公元前 655 年齐桓公依照管仲之谋,与宋、鲁、陈、卫、许、郑、曹等国君会于首止,与周世子郑定盟,确立世子郑的太子地位,以稳定周室。周惠王指令郑国与楚国联合,离间首止之盟。郑文公于是不辞而别。公元前 654 年齐桓公谴责郑文公逃首止会盟,率诸侯讨伐郑国。郑请求讲和。公元前 653 年齐桓公与鲁、宋、陈、郑于宁母(鲁邑,今山东鱼台)会盟。公元前 652 年齐桓公与鲁、卫、宋、许、曹等国君会盟于洮,以固周襄王之位。公元前 651 年周襄王派太宰赐齐桓公胙。所谓胙就是祭祀用的肉,周王给诸侯赐胙,是对诸侯的尊重。齐桓公与鲁、卫、郑、许、曹等国君会盟于葵丘,庆贺天子赐胙。

公元前 650 年北狄侵犯卫国,齐桓公率师相救。公元前 648 年齐桓公会同诸侯为卫国筑新城,以防备北狄入侵。公元前 647 年齐与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君会盟于咸,共谋保卫周室,防备戎人入侵。公元前 654 年齐、宋、鲁、陈、卫、郑、曹诸君会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商讨伐楚救徐之策。

就在公元前 645 年,管仲逝世。紧接着,公元前 643 年齐桓公薨。齐国诸公子争夺君位,齐国大乱。易牙杀群吏,拥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昭逃奔宋国。公元前 642 年宋襄公平齐乱,太子昭继位。

可以说,齐国的霸业与管仲是密不可分的,管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



政,编练军队,使齐国强盛起来。他并且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所以孔子虽然不认同管仲,说“管仲之器小哉”;但对于他的政治成就则是十分欣赏甚至佩服的,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一书表达的主要就是管仲学派的主张,管仲学派特别喜欢讲天道与人情。《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管子》还体现了“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讲的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就是汲取,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是非常深刻的谋略。《形势》篇中还谈到必须按天道办事的道理,认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功。《管子》认为掌握时机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向转化。

《管子》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上,这一思想是管

仲辅助齐桓公创立霸业时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百姓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到战国时,管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这一思想,并结合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构思出一种具有特色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另一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而下的集权。这样,它既不同于儒家照搬周宗法制的那种模式,又与法家的那种全是军队编制的社会结构区别开来。在《管子》一书的《立政》、《乘马》、《小匡》等篇中,都讨论过这种社会编制。

《管子》的政治思想还体现在它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管仲学派在书中设想出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统治方术,而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这就是“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在《互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大意义。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把维护国家统治的“四维”看成是四条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断了,国家就要倾斜。与此同时,管仲学派也极力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管仲学派认为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



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因此从统治的角度来说，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管子》的政治及经济思想，还体现在它的争取民心 and 注重耕战的主张上。齐国的兴起，是靠收买民心起家的，他能比较深刻的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对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意义。《管子》一书中所讲的争取民心 and 注重耕战的思想，就是齐国统治方法的总结。在管仲学派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予之为取”。就是说，给予就是取得，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换言之，他自己的统治也越顺畅，越有效，从争取民心出发，管仲学派很注重耕战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治国”、“富民”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粮食生产多了，才能国富兵强。同时，他们认为战争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太大，因而主张“慎战”，也就是不轻易发动战争。

虽然如此，《管子》中却讲了很多军事方面的道理。《管子》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管子》坚决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

《管子》没有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把军队建设与